

第四章、東協對中共威脅的認知

自古以來，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對外關係發展，都深受中國的影響，東南亞區域的國際關係如果將中國的部分拿掉，將會顯得貧乏與失去重心。且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就一直不斷的向南方輻射出它的文化、權力等影響力；¹東南亞國家亦經常遭受中國的軍事威脅，另外中國發生戰亂的時候，東南亞也會成為大量中國移民的選擇。因此，在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勢力以前，中國的勢力一直籠罩著東南亞，東南亞國家亦將中國視為區域霸權。

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初期政權立足未穩，中共對周遭國家釋放出和平共處的訊息，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與中共國力的增長，中共對外政策亦隨之改變，一直到近年中共的睦鄰外交、和平崛起等等政策的實踐中，東協也一直是中共重視的區域。基於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密切，中共的對外政策即使是小小的改變，都將影響東南亞國家的生存與發展。

第一節、共產黨的威脅

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已聚集了強大的武裝力量，並在蘇聯國際共黨的支持下，也早就開始對東南亞國家散佈共產主義的思想。中共1949年建政的時期，東南亞的各殖民母國正從二次大戰的殘破中重建，它們需要東南亞殖民地的各種資源，但是國家獨立的聲浪，也在各殖民地中發起與蔓延，因此對東南亞的解放一直未落實，中共藉此理由正式開始向東南亞推展其共產勢力。

1953年毛澤東曾擬定一個所謂「世界革命方案」，他說：「亞洲是我們當前第一目標，激進政策在亞洲將有重大收穫」，因此他說要「給予中南半島同志及友人以最大助力」，又說：「中南半島解放後，緬甸、泰國、印尼的革命，自然瓜熟蒂落，馬來半島盡入掌握之中」。²毛澤東的指導計畫，展現了中共對東南亞的野心，在後續的二、三十年間，中共也一直以此為依歸，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前進。

一、意識型態的威脅

1946年時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向美國發出電報，而這份電報亦

¹ 吳俊才，《東南亞史》，（台北：正中書局，1977年1月），頁1。

² 張劍華，《東南亞的變局》，（台北：正中書局，1979年2月初版），頁21。

即後來於 1947 年 7 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上刊載的文章："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³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就指出了第二次大戰後的主要國際政治矛盾是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這種認識很快就被東西方兩大陣營的領導人所接受。⁴1949 年中共建政，初期它宣佈向蘇聯「一面倒」，但是共黨國際的關係仍是顯得緊張；中共雖與蘇聯同為共產主義意識型態，但是卻深感蘇聯與美國勢力的壓力過大，將限制其發展，因此中共一直企圖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初期，就注意對南洋地區的滲透活動，並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共黨組織，以吸收華僑為主要任務，因此新馬地區就成為共產黨主要的活動發展基地，更是中共在爭取國際共黨正統地位的重要區域。

1954 年中共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1956 年中共又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十項原則，這些釋出的訊息，其實都是在宣示對鄰國的善意與支持，並對東南亞國家爭取獨立以及區域的中立主義與不結盟運動給予公開支持。1956 年赫魯雪夫提出共產修正主義，提議與西方國家和平共存的主張，遭到中共的強烈抨擊與反對，也為中共積極擴張勢力提供動力，中共開始扶植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並提供援助來反抗殖民與專制政權，以提高它在地區的影響力。1958 年中共對金門發起 823 炮戰，蘇聯不願與美國為敵，故未支持中共行動。1960 年中共大躍進失敗，蘇聯撤走對中共所有的經濟援助。1962 年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衝突，在這次武裝衝突中，蘇聯不但未支持中共的行動，甚至更提供武器等相關援助給印度，造成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更加惡化，終於導致共產國際的分裂與衝突。

中共反蘇的主要目的是想脫離蘇聯的長期制約，並擴展自己的外交關係與勢力範圍，期能成為國際共黨的主導者；正如 1974 年江青對中共外交人員講話所強調的，她說：「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實施共產主義」，並且它指明「世界革命的焦點在亞、非之間」，並鼓勵各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戰線，...並取得政權」。此外，1977 年中共外交部長喬冠華曾對中共幹部說：「建交不過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形式，並不能夠通過建交就達到改變制度，因為革命最終還得靠本國人民自覺起來推翻反動統治階級」，此外他又說：「我們無須用金錢大砲強迫別國人民走中國的路」，⁵這就暗示中共要用滲透顛覆的手法來進行「革命輸出」。中共建政初期是篤信馬列思

³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1998), p. 10.

⁴ 《大公報》，香港，2000 年 7 月 19 日。

⁵ 張劍華，《東南亞的變局》，(台北：正中書局，1979 年 2 月初版)，頁 40-45。

想，它對東南亞國家民族解放運動是全力支持。中共一貫強調自己是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一邊，支持他們反抗壓迫、爭取獨立的鬥爭，並把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友好合作，作為其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中共對東南亞各國是採取黨、政分離的作法，一方面與各國政府建立關係，一方面支持各國共黨的武裝鬥爭，不論東南亞國家與中共的關係如何親密，事實上中共對東南亞各國共黨的軍經援助是持續不斷的。直至 1970 年代末期，中共基於內外政策需要，開始轉變對區域共黨組織之援助政策，並在 1991 年與所有東南亞國家完成關係正常化，惟中共仍繼續進行「黨對黨」、「政府對政府」的雙軌外交，只是「黨對黨」的政策內涵已經不僅是以共黨為交往對象，而是所有民主政黨。

馬來西亞前總理胡先翁曾說：「共產制度扼殺個人自由，如果共黨在馬國得勢，則馬國的經濟成果以及民主制度，都將蕩然無存」、「如果安全不能確保，則政治經濟便無由穩定」。事實上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共產黨的入侵，早就有所警覺，只是早期國家政權尚未穩定，並無足夠力量予以清剿，政府在國力日強且共黨勢力擴大並漸顯奪權之勢時，各國政府就開始了清剿的工作，且在完成清剿後，一并執行各項防堵共黨勢力死灰復燃的工作；例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都曾制定反共條例或相關法律，明令禁止共黨勢力的活動，但是因為各國國情不同且隨著新領導者的上台，在反共的作法上就產生變化。1975 年中南半島越、寮、柬的相繼赤化，加深各國對美國所提「骨牌理論」的疑慮，紛紛開始自保動作，泰國發動了不流血政變成功，順利建立反共政府，並厲行反共政策，加強剿共行動，堅定了東南亞各國的反共決心。

1976 年東協第一次高峰會中，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及印尼等國，就針對共黨威脅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的雙邊會談，並簽定「東協和諧宣言」及「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也就是希望藉多國合作及團結的力量，來與共黨侵略抗衡，會後簽署一秘密「備忘錄」，建議各國採取聯合行動對付共同邊界的共黨活動。⁶中共支持東協各國共黨武裝叛亂活動，嚴重威脅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權，即為中共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正常化延遲的主要原因。

二、東協各國國內共黨勢力威脅

1953 年中共成立「共產國際亞洲局」，並設立「東南亞革命委

⁶ 張劍華，《東南亞的變局》，（台北：正中書局，1979 年 2 月初版），頁 80。

員會」等工作組織，且直接派遣共黨代表主持援助及監督各國共黨委員會相關事宜。⁷直至 1960 年代末期，除了越、寮仍徘徊在中蘇共之間，中共已經獲得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支持，積極爭取其在國際共黨的正統地位。

馬來西亞共黨組織發展極早，1920 年代列寧就曾召集許多馬來亞青年到莫斯科受訓，希望成爲未來組織馬共的基本幹部。1930 年越共胡志明正式組織馬共於新加坡，初期隸屬印支共黨組織建制，由此顯示早期馬共組織關係複雜。直至 1947 年馬共由華人陳平接任總書記，才開始傾向接受中共的領導與援助。馬共在 1945 至 1948 年間在馬來西亞是具有合法地位的，但是陳平接手後，開始擴大叛亂行動，又被政府取消合法地位。1955 年馬來亞在英軍的協助下，擴大剿共的範圍，期中馬共雖然提出停戰和平談判的要求，但爲政府拒絕，並在馬來西亞正式獨立後，積極圍剿及召降，終使馬共數量急劇減少一蹶不振。

印尼在 1950 年與中共建交，是東南亞第二個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早期的印尼親共其主要原因是因爲在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對抗中，蘇聯並未予以支持，反倒是中共因爲支持馬共對抗其政府，因此也聲明支持印尼，並獲得印尼的善意回應。⁸也因此印共得以擴張其勢力，1965 年印共在中共的支持下發起軍事奪權，爆發「930 政變」，印共的殘酷作法，遭致全國的唾棄，隨著全民反共情緒的高漲，同情共黨的蘇卡諾也因此喪失政權，而由堅決反共的蘇哈托接掌；印尼朝野反共態度固然堅決，但是國內政情不穩定，人民窮困且貧富不均，給予共黨一個培育的溫床；此外印尼的排華運動，更使得印尼華人產生許多不滿，這種狹隘的民族意識觀念，也容易爲共產黨作爲製造顛覆政府的藉口，也因此印尼政府中的軍人勢力，始終尾大不掉，這也可說是共產黨所造成的重要影響。

泰共在 1964 年開始大量接受中共的軍援，泰共高階幹部接受中共軍事訓練及意識型態戰略指導；同時泰共也透過越南接受蘇聯的援助，並由越南提供泰寮邊界附近的避難所，造成泰國政府軍多次圍剿而不能將其清除。⁹1978 年中越邊境產生多次疆界糾紛，且中共對越南入侵寮國多次與東南亞國家聯合發表不滿言論，因此越

⁷ 楊建成，《華人與馬來亞建國》，（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2 年 3 月初版），頁 190。

⁸ 謝福進，〈東協國家之安全觀及其對中共威脅認知的演變〉，《海華與東南亞研究》，第 3 卷第 4 期，秋季號，2003 年 10 月，頁 14。

⁹ Melvin Gurtov,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Heath Lexington Books, Toronto & London, 1971), pp. 15-18.

南切斷泰共與中共間的補給線；此外也由於中共與美國建交等內外政策因素需求，中共改變了與泰共的關係，造成 1980 年中期以後，泰共勢力逐漸消退。

菲共的正式組織在 1930 年創立，初期是以蘇聯國際共黨的支持為主，雖然未能取得政府中一席之地，但是藉由「土地改革」為號召，卻也擴充不少實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菲共利用此一機會聯合愛國團體，以統一戰線為名，組織「人民抗日軍」，打著民族主義旗號壯大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深切了解菲共野心，對菲共採取斷然措施，解除「人民抗日軍」的武裝，並勒令解除菲共在各地建立的非法政權，但在逮捕菲共頭目後又予釋放，造成 1946 年菲共又組成全國解放軍從事全面叛亂。1950、1960 年代菲國政府全力清剿共黨，並積極加強經濟建設及改善農村生活，使得菲共勢力愈來愈弱欲振乏力。1969 年中共介入，協助菲共組成新人民軍，其人員訓練及武器裝備都是由中共提供，其勢力又再度興起。1975 年菲國總統馬可仕赴北京，期望藉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能夠換取中共取消對菲共的援助，事實上並未如願，因為如前所述，中共採取的是雙軌策略，即使雙方建交且關係密切，中共對共產黨的支援是不會停止的。中共對菲共的支援雖然也在 1978 年以後漸漸停止，但是菲共的勢力已經建立，政府軍幾乎無法將其完全殲滅，造成菲國國內情勢的動盪，也影響菲國經貿發展。

新加坡在 1965 年建國以來，就由新國總理李光耀率領人民行動黨，來進行新國的建設；共產黨勢力雖然企圖介入顛覆新國，但是新加坡在以黨領政的政策原則下，事權統一績效卓著，經濟成長國家安定的情況下，新國共黨的活動均無法獲得人民認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對新國有所謂違反人權的評價，但是事實上這種類似「開明專制」的做法，卻受到新國人民絕大多數的認同。正如受訪者新加坡的 Y 先生及 G 小姐所說：

「新加坡沒有人權問題，因為我們有相同的價值觀，我們認為政府的作法，是保障人民安全與福祉，只要國家天天在進步，人民生活過得更好，就是最佳的人權保障。」

「事實上我國有共產黨的存在，但是它們對政府的批評以及一些主張，非但不能獲得人民的認同，有時更會遭到全民抵制，因此它們的空間是很小的，更無法影響政府的運作。」

緬甸在 1948 年脫離大英國協獨立，其民主政治的施行一直並不順遂，執政當局無能，造成國家混亂鬥爭不斷；終於在 1962 年由

軍事強人尼溫將軍發動軍事政變，開始緬甸的軍人專政的局面。¹⁰ 尼溫執政後，就實行「社會主義」，並成立「緬甸社會主義計劃黨」(Burma Socialist Programme Party, BSPP)，由其一黨專政。¹¹ 尼溫政府統治期間，正處於冷戰的兩極對峙中，它希望能採取一種「中立主義」，但是在國內外情勢的壓力下，很難不向某些大國靠攏。中共在意識型態上與緬甸是接近的，更獲得地利之便，就在這種情況下介入緬甸軍政府，初期中共提供武器軍援給緬甸，進而在 1970 年初期，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的交流合作更明顯增加。¹² 中共與緬甸的軍事合作以軍援方式居多。中共的考量是藉由軍、經援助，換取緬甸同意中共在緬境使用軍事設施，作為中共從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戰略。1989 年至 2003 年緬甸政府已向中共採購近 14 億美金的武器裝備，¹³ 此外美國因其人權問題所採取的一些措施，亦使得中共與緬甸政府的關係更加緊密。

越南是東協國家中與中共關係較為複雜的一國，由於越南實施排華政策，中越兩國一直處於長期對抗的狀態。越戰結束後，美國在東南亞勢力削弱，蘇聯與越南結盟加強在該地區的滲透與擴張，並朝成立印支帝國的道路邁進。1978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同時又與中共發生邊界糾紛，造成中共邊界人民的生命財產重大損失，兩國關係迅速惡化。也因為此種做法威脅到中共南方邊界的安全，更截斷中共向南「革命輸出」的管道，因此中共在 1979 年 2-3 月發起「自衛還擊戰爭」；不論雙方勝敗，戰後雙方就邊界問題談判未獲結果，中越關係就此更為緊張；1988 年中越又發生南沙群島赤瓜礁武裝衝突，在此期間中越邊境糾紛也從未停息。直至 1991 年中越才恢復正常外交關係，除針對邊界問題進行多次協商，雙方也進行經貿合作的對話，從 1991-2000 年間雙方共簽定四個聯合公報及兩個聯合聲明，其中 1999 年簽署了「中越陸地邊界條約」最具代表意義，象徵雙方在陸上邊界問題上已清楚解決，並更進一步協商海上邊界問題。從多項協議內容來看雙方政府都為尋求「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而努力，但是，雙方爭議的絕不僅僅只是邊界劃定，南沙群島許多島嶼的主權問題，更有許多鄰近國家牽涉其中。儘管如此，中越雙方的頻繁接觸，現階段已獲得一些成果，在

¹⁰ 金榮勇，〈緬甸軍人政府的未來發展--加入東協後之展望〉，《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7 年 3 月，頁 82-83。

¹¹ 陳勁，〈緬甸在東協的角色及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2000 年 9 月，頁 17。

¹² 唐希中等著，《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1949-200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4 月)，頁 245。

¹³ 林正義，《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軍事交流：解放軍外交》，

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rnals/150-9/m155_4.htm

此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爭議雖然難免，但戰爭發生的機率已大幅降低。

三、中美建交後的關係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後，美國一直支持中華民國對抗中共，中共則在外交上全面倒向蘇聯，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就十分嚴峻。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派第七艦隊據守台灣海峽，阻礙中共攻台企圖，中共也警告美國不得越過三十八度線，後來美國不理中共，更使中共懷疑美國在進侵北韓後，會乘勢直撲中國東北工業基地，中共即派志願軍赴北韓支援作戰，中美兵戎相見。美國宣佈對中共進行經濟封鎖，在外交上拒絕承認中共，阻止中共加入聯合國，大大阻礙了中共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韓戰的爆發使中美雙方的不信任迅速擴大，使本來已十分惡劣的關係變得不能調和。美國對中共全面圍堵的政策，一直維持至 1970 年代初才漸漸解凍。

1971 年 4 月中共運用「乒乓外交」改善了雙方關係。美國也藉此宣佈放寬對中國的禁運、放寬貨幣管制、加快訪中的美國人簽證、准許掛外國旗的美國船隻停泊中國港口，中共與美國的關係開始解凍。當年 7 月季辛吉與周恩來在北京會面，促成 1972 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1977 年卡特總統上任亦受邀訪問中共，同意改善雙方關係。1978 年 12 月雙方簽署建交公報，並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中共與美國建交是其對東南亞各國關係改變的重要轉捩點。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與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主政有絕對的關係，他知道 1967 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重創了中共的經濟、文化和科技；鄧小平復出後，一直在考慮如何彌補損失，趕上世界先進國家。他改變了過去的鎖國政策，也改變中共一貫的外交戰略；過去中國重點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鬥爭，鄧小平的外交戰略較強調國際合作，他認為外交戰略的重點之一是要建立和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這是他全球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戰略對中共地位及世界形勢的審度都是非常精確。他所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判斷和看法，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外，鄧小平的政策非常務實，講究實際，尤其是在經濟方面。¹⁴務實主義的態度主要體現在與美國的關係上，鄧小平同意美國繼續與台灣維持某種關係，並在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的

¹⁴ 《西安日報》，2004 年 8 月 20 日，
<http://big5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4461036/A31566.html>

情況下建交；他把台灣問題暫時先放在一邊，以加強與美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尤其是經濟貿易合作，也就是中共說的求同存異，這種觀念與做法的改變，使得中共在外交上開始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這種以經濟合作代替政治對抗的外交戰略，不僅改善和加強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尤其對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開始有了重大改變。¹⁵ 1979年9月鄧小平訪問北韓及日本，更在11月訪問東南亞三國，他訪問東南亞的目的是向這些國家宣傳，中共將以「和平與發展」兩大主軸來拓展外交關係，此外，他更強調當時的越南，在蘇聯的撐腰下，將是中共與東協最大的危險，並暗示中共無意在東南亞搞革命，只希望東南亞局勢穩下來。

事實上，東南亞各國都一直在追求著一個共同目標，也就是創造一個有利於貿易和經濟發展的和平地區環境。1967年東協成立，1976年5國領袖在印尼峇里島召開第一次高峰會議，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其核心原則包括：放棄訴諸武力和武力威嚇，以和平方式解決各種爭端，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彼此內政。而東協所提出這些主張，恰與中共當時的戰略目標不謀而合。

此時的泰國正對越南向西擴張勢力產生極大疑慮，因此提出要求聯合國成立以東協為中心的聯盟，以促使國際社會注意越南在柬埔寨的行為，並與中共共同迫使越南撤出柬埔寨，並使東國成為中立國家。¹⁶ 馬來西亞及印尼因為中共支持共產黨作亂，故對越南處境表示同情，但是卻因越南拒絕簽署東協提出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反而促東協各國紛紛與中共站在同一陣線來譴責越南。¹⁷ 中共在此時與美國建交，顯示美國拉攏中共對付蘇聯的戰略意涵，且中共也對鄰近國家全面釋出善意；東協國家長期以來就在美國的支持下，大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但是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東南亞又面臨越南勢力的擴張，促使東協與中共形成一種有相同目標的合作戰略關係。中共為此在1979年2-3月發動「自衛還擊戰爭」，並在中越邊境陳兵十年之久，更大力支持東協在1982年提出的「抗越柬埔寨三派聯合政府」爭取聯合國合法代表權地位的提議。¹⁸

¹⁵ 《人民日報》，2004年08月04日 版三。

¹⁶ Bernard k. Gordon, "Sou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in James C. Hsiung ed., *Asia 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oulder & London, 1993), pp.142-144.

¹⁷ Amitav Acharya, *A New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 ASEAN in Post-Cold War Era*, (Adelphi Paper 27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3), p. 9.

¹⁸ 陳鴻瑜，〈東協對中共的政策〉，

<http://www.inprnet.org.tw/inprc/pub/biweekly/110-9/m119-3.ptm>.

中共與美國建交後，這段時期是中共建政以來與世界各國，特別是周邊鄰國友好合作關係的建立和發展最迅速、最廣泛的時期，雖然東協對中共的用心仍懷有疑慮，但在戒慎恐懼之態度下，雙方的關係也確實逐漸改善。尤其在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更可看出中共與東協關係的顯著改變。

第二節、1997 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

1997 年金融風暴對東協的最大影響有二，一是東協國家對區域整合範圍擴張及加強緊密聯繫的需求。一是給予中共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

1976 年至 1996 年這二十年期間，是東協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除了經濟發展外，無論在政治、文化與區域安全上，東協也取得相當的成果；亞洲開發銀行在預測 1997 年東南亞經濟發展情況時，提出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前景作出樂觀的評估，亞銀認為：「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經濟，預期在 1997 年及 1998 年仍會有強勢表現；全球貿易環境的改善將會導致強勢的出口成長」。¹⁹ 面對於 1996 年東南亞國家面臨出口衰退的景象，東協各國似乎對其經濟成長仍舊抱持樂觀態度，其主要原因在於整體的經濟指標都顯示，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等國的總體經濟狀況皆十分穩定。東協各國的財政部長也在當年 3 月舉行第一屆東協財政部長會議後發表聲明，各國財政部長一致同意「東協持續成長的經濟基礎仍然很強」。²⁰ 這些樂觀論調言猶在耳，就在四個月後，東南亞發生了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

歸咎此次金融風暴發生的原因，係東南亞各國經濟體制不良及外在環境的改變所致，其中詬病最大的是過於依賴外資。東南亞各國隨著經濟起飛，進出口皆成長迅速，近幾年雖然成長趨緩，然進口趨勢仍未見減緩，使得資本帳出現赤字，但在外資不斷注入下，國際收支帳仍呈現順差的狀況。因東協國家金融體制的不夠健全，未能及早反映及管制，而注入外資主要投注於股市與房地產市場，對本國實質生產沒有太大的助益，反而造成泡沫經濟的隱憂。1997 年 5 月 8 日，美國德州儀器公司宣布撤離在泰國的資金，泰銖便一路走低。直至 8 月 11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應允提供協助時，泰銖貶值幅度已達 18.6%，由於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密切，泰銖劇貶立即引發東南亞貨幣市場的混亂，繼泰銖劇貶之後，菲律賓披索便遭投機客的攻擊，至 8 月 15 日，披索貶幅達到 11.4%。其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國，亦無法置身事外。東南亞國家就是在這種金融體系不夠健全情況下，過度膨脹信用發展起來的，一旦遇到外資撤出，便無法應付

¹⁹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1997 and 19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

²⁰ Joint Press Communique, The First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Phuket, 1 March 1997, <http://www.aseansec.org/economic/prfin1.htm>.

整個匯市的震盪，而匯市混亂亦更擴大，造成實質面經濟的崩跌。

其次是外在環境方面的改變，由於國際經濟情勢的轉變，中國大陸及越南等國家的產品競爭力持續擴大，造成東南亞各國的出口衰退，而一向依賴日本投資的東南亞國家，在日本經濟情況日漸惡化下，東南亞各國經濟就受到更嚴峻的考驗。²¹

在面臨東南亞金融風暴時，東協似乎是手無寸鐵不堪一擊的區域組織；東協長久以來一直堅持的二項原則「共識決」之決策模式與「不干涉內政」，更顯得軟弱不堪。以共識決而言，東協自成立以來，其決策模式是透過溝通、協調來產生共識，講求在過程中避免衝突及建立互信，這種決策模式對於一個包含有多元民族、多元文化、以及多元宗教信仰的區域組織而言，是不得不然的選擇。這種溝通協調取得決策的模式對東協凝聚向心力上是有貢獻的，尤其在外交成就上，東協對外統一發聲，以集體行動獲得與大國協商的機會與談判的籌碼。但事實上東南亞地區本身就是一個多樣性的地區，各國的歷史、種族、宗教、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構成了東南亞國家在跨國合作、多國合作乃至於東協在區域整合的多重障礙。²²在區域經貿整合上，「共識決」卻變成「猶疑不決」，在金融風暴初期各國相繼受到波及，也都明瞭危機嚴重，但是各國經濟利益原本就是利己多於利他，因此對話溝通的過程很難取得一致的共識，即使獲得部分共識，援助已緩不濟急。更何況協商的共識，對各成員國沒有任何拘束力來促使相互幫助，也沒有相關機制能夠介入處理跨國性問題，各國都在「東協方式」的堅持下尋求自保，區域組織顯得毫無作用。

「不干涉內政」原則一直是東協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為了符合本國的長期利益，東協國家除了相互克制不涉入其他國家的內政外，區域內各國領導者所強調的「亞洲價值」，則是權威者用來抑制人民追求權力的藉口。長期以來經濟成長成為各國掩蓋其政權合法性的外衣，東協國家眼裡對於鄰國種種侵害人權的行為都可以合理被解釋為「必要之惡」，²³但是金融風暴後，卻引發了東協國家質疑這些政策的合理性；因此泰國外長蘇林匹旺(Surin Pitsuman)開始主張各國應公開討論影響他國的內政問題，也就是所謂的「彈性介

²¹ 宋鎮照，《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台北：五南，1999年3月），頁321。

²² 田中青，《站在新的起跑線上的東南亞》（台北：五南，1993年），頁73。

²³ 林若雱，〈亞洲價值的再檢視--金融風暴的政治經濟分析〉，《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及淡江大學國際研究院編印，1999年10月），頁12。

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press/paper/ppr_mnu.htm

入」他國的內政。²⁴ 泰國總理川立沛（Chuan Leekpi）也在 1998 年的第六屆高峰會中指出，東協需要一種新思維，來加強國家間的互動與深化對話內容，同時亦應加強對影響雙方或多方問題的合作；他更明確的說：「如果我們的鄰國陷入麻煩，我們不能只是在周圍築起一道牆；我們必須以增進關係及合作的方式行動」。²⁵ 泰國的提議並非事事介入他國事務，而是選擇性的干涉與建議其他國家行必要的措施，這項建議在當時並未獲得多數國家的認同，但這卻是東協國家重新審視修定，促進區域合作安全作法的始頁。

東協組織在此次金融危機發生後，除了東協一貫堅持原則所導致的問題外，東協國家也意識到必須加強其秘書處功能的強制力，更發覺區域整合的落實對各國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功效及影響。東協未來的發展，除了對「亞洲價值」的重新思考外，隨著各國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進步，原本維繫各國政治社會穩定的力量必然受到衝擊，對維護區域乃至所有成員國家「經濟安全」的機制，需作必要的修正及調整，且國家經濟制度的調整並非祇重視自己一國而已，必須更著力於「區域聯防」的處理機制。²⁶

金融風暴的爆發，對東協各國產生極大的傷害，也促使東協各國對「經濟安全」的更加重視。為了近一步加強東協的經濟合作，在東協第六屆領袖高峰會中，東協發表了「河內宣言」，宣示將依「河內行動計劃」、「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及「共同優惠稅率計劃」等計劃方案所規劃，加速東協各國的經濟改革行動，擴大區域性經濟整合。在此次的高峰會中是以經濟議題為討論的重點，對於相關議題所獲得改革性的意見，更是過去數十年以來最具一致性共識的一次。

金融風暴幾乎席捲整個亞洲，但是中共卻未受明顯衝擊，且尚能保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局勢，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政治、經濟的客觀環境條件與其他國家有以下幾點不同：

- 一、中共的經濟活動與市場經濟活動的本質相差甚遠，且人民幣的匯率是由政治政策決定，而非市場來決定。
- 二、中共資本市場尚未開放，在資本帳不可兌換及外匯管制情況下，外國投機客不易介入炒作人民幣兌換美金匯率。
- 三、中共外債與其外匯存底金額大約相同，故其償債能力較東協與

²⁴ 陳勁，〈緬甸在東協的角色及影響〉，《問題與研究》，2000 年 9 月，卷 39，期 9，頁 32~33。

²⁵ 泰國總理 Chuan Leekpi 在東協第六屆高峰會議發言，1998 年 12 月 15 日，<http://www.mofa.gov.vn/english/phantbieutl.html>。

²⁶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1999 年 10 月），頁 214~221。

韓國強。

- 四、中共人民並無大筆存款實施搶匯。
- 五、大陸工資水準較亞洲其他國家為低，故國家相對競爭力較強。
- 六、中共由國家掌控資金及信貸，相對其他國家由銀行掌控，中共更能避免超貸及信用過度擴張的情形。
- 七、中共在 1995-1997 年創造了空前的對外貿易順差紀錄，故中共不需仰賴外資持續流入來平衡貿易赤字。²⁷

中共在這次金融風暴中巧妙的避過經濟所引發的混亂局勢，並維持與其他國家相對較強的經濟力。此外，中共堅持人民幣的匯率不貶值，除保障本身的經濟穩定外，對衝擊較深的東協國家，更像是一顆定心丸，降低了金融風暴的深化影響。另外，中共在其經濟環境相當吃緊的情況下，仍然提供 40 億美金參加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援助，援助的金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並且對印尼等相關國家提供出口貸款補助及檢討變通貿易方式，以改善東協國家的經貿問題。

金融風暴後，中共與東協在經貿往來、資訊交換與科技交流合作上，變得更積極。就中共的觀點言，東協國家的經濟力量能夠復甦，將更能強化東協國家作為中共出口市場的能力，且有利中共的投資市場；因此，東協國家的復甦不僅不會威脅中共的經濟發展，反而會是中共經濟發展的一股助力。²⁸

中共這些穩定亞洲經濟、促進亞洲經濟發展的作法，不僅贏得區域國家尤其是東協國家的讚揚，更有助其國家聲譽的提昇，且塑造出維繫區域經濟安全的正面形象。金融危機後，東協對中共的經貿依賴度大幅提高，造就中共以經濟包裹政治企圖插足東協事務的機會，更將使中共在亞太地區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與穩固的地位。

²⁷ 張惠玲，〈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00 年 2 月，頁 60。

²⁸ 宋國誠，〈論中共經濟國力—歷史累積、戰略目標與前景預測〉，《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3 期，1997 年 3 月，頁 43-45。

第三節、中國威脅論與和平崛起

一、中國威脅論：

冷戰期間，美蘇兩大強權主導了國際安全問題，東南亞地區成爲美蘇兩極的一個角力場。當時的中共雖然在美蘇之間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共的實力不足，造成其一直未能如願的形成美中蘇三角鼎力的爭雄之勢。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美軍撤出東南亞，東南亞沒有了一個具有政軍實力堅強的守護者，區域的安全頓失依靠，引發所謂東南亞「權力真空論」。²⁹就在此時「中國威脅論」悄然上場。

「中國威脅論」是從 1992 年開始出現，美國外交政策研究院的亞洲部主任穆諾（Ross H. Munro）在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季刊發表文章，指出中共的軍事現代化的結果，其軍力已遠遠超出東亞區域國家的軍事能力；且中共認爲蘇聯的解體與美國自菲律賓撤軍，是其建立亞太地位的最好機會。³⁰美國時代雜誌也提出，中共發展籌建「藍色海軍」的構想，目的就在將其勢力深入太平洋及南海地區。³¹無論中共真正的戰略目標爲何，「中國威脅論」的散播，已將中共積極爭取取代美國成爲區域霸權野心的印象深植人心，中共也受到此種論調的嚴重影響。

中共絕不承認其爲世界或區域安全的一個威脅，中共爲避免此種論調的影響，除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向各國解釋中共的國防立場，更透過發表國防白皮書，駁斥外界對中共的批評。1993 年中共總理李鵬會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時就強調，有人散佈所謂中國威脅論是別有用心的，事實上一個繁榮的中國，是亞洲與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共一直是反對霸權的，即使強大了也絕不會成爲霸權。³²1995 年中共外長錢其琛在東協外長會議中，向東協各國外長表示，「中國的經濟起飛，是爲提昇十二億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對人類是一種貢獻而不是威脅；如果中國的經濟不能發展起來，十二億人民停留在貧窮落後的狀態，那對全人類來說才是一種威脅」。他更強調：「中國在歷史上從未向外擴張，中國即使強大了，也不會欺負、威脅其他國家」。³³

²⁹ William J. Corwe Jr. and Alan D. Romberg, "Rethinking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2 (Spring 1991), p. 124

³⁰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62 (Fall 1992), pp. 10-16.

³¹ James Walsh, "China: The World's Next Superpower," *Time(Asia Edition)*, May 10, 1993, pp. 15-39.

³² 《新華月報》，1993 年 6 月，頁 107-108。

³³ 《新華月報》，1995 年 9 月，頁 146。

中共雖然努力消除雜音，但是伴隨經貿實力的成長，中共的軍事現代化腳步也一日未歇。冷戰結束後，來自東方與北方的威脅降低，中共在降低了鄰國侵略的威脅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如以人力、自然資源、政治、經濟與軍事等要素計算，中共的國力在 1993 年僅次於美國，早已超過日本、德國與俄羅斯。³⁴ 雖然美國學者不否認中共軍隊在結構改變，與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上的努力，但是他們仍認為中共還是缺乏與其他軍事強權匹敵的資源，在當時並不具備建立區域支配或是成為世界強權的能力。³⁵ 即使如此，中共的軍力是事實存在的，對中共的鄰邦來說，中共不論是威脅還是朋友，它都是一個值得敬畏的國家。

中共在其週邊國家推行睦鄰政策，致力消除中國威脅論。但是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威脅論」的高度敏感，卻是各有其歷史淵源，各國對一個強大中共也有不同的認知。

馬來西亞雖然深受中共支持馬共叛亂之苦，但是由於馬國獲得英國的支持，積極剿共，使共黨勢力在馬國已無生存空間；因此，馬國總理馬哈迪認為中共軍備確會引人擔心，但是他認為那是一種軍備競賽下的恐懼，如果能夠改變相互間對待對方的態度，透過相互間關切與共同利益事務的意見交換，將能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並逐次建立起區域內的信心。因此馬來西亞對中共採取的是「建設性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 的策略。受訪的馬來西亞 W 小姐說：

「在馬國境內，幾乎聽不到共產黨的活動消息，政府對中國的態度一如其他國家，一般人民對所謂中國威脅論是沒有任何概念的。」

「華人的社群雖然都認同華人的傳統文化，但或許是馬國政府對政治訊息的管制較為嚴謹，實際生活中，馬國的華裔是認同馬哈迪的作法的，對中國的態度是親近及保守的。」

新加坡非常了解中共強大軍力的現實，它承認中共是東亞的霸權；雖然中共並未直接威脅新國的安全，但是新國以維持高經濟成長率、領土完整及政治秩序為其三個核心價值，中共在此區域所涉及的南海島礁主權爭議、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問題，都將影響區域的穩定與發展，當然也會影響新加坡的利益，但最重要的並非軍事安全問題而是經濟上的問題。新國前總理吳作棟數度表示，現在無

³⁴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頁95。

³⁵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Norton, 1997), p. 156.

法預測中共會採取冒險主義或是擴張主義，但都不能排除此一可能性。³⁶ 受訪者新國Y先生指出：

「中共強大的綜合國力並不是威脅，新加坡政府常常提到的是中國挑戰論，因為就新國來說，中國的綜合國力提昇，對新加坡的影響最大的就是經濟力，因為國家追求的就是國家的安全與利益，長期以來中共的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並不直接威脅國家安全，對新國及東南亞而言，中共的軍力並不是威脅，反而是日漸強大的經濟力量，才是影響新加坡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

泰國長期以來在外交上是較現實的，它對強國的依附，使它在建國的歷史中能夠繼續存活。此外泰國與中共並無領土衝突，泰國境內也沒有華人問題，因此泰國是東協中對中共最具善意認知的國家。此外，中共是其鄰國中最強大的國家，在其周邊的緬寮柬三國，又都有內政的問題，亦將會影響泰國的安全，因此泰國積極與中共拉近關係，除了向中共採購軍備外，在東協等國際會議中，也支持中共的外交立場。泰國希望看到的是一個富裕繁榮的中國，而不是貧窮的中共，經濟繁榮經會給區域帶來一股穩定的力量。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是，泰國並不在意中共在南海的主權的企圖，它較注意的是中共涉及領土爭端會危及區域穩定，以及中共提供緬甸數量龐大的軍火。³⁷

菲律賓與中共的關係，基本上是隨美國與中共關係而改變，1970年代末期中美建交，菲國並不視中共為威脅。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國，菲國尚未改變對中共的看法，直至1995年中共佔領美濟礁，菲國公開指責中共威脅其國家安全，菲國對中共的態度才有了重大的改變。³⁸ 中共與菲國之間的問題並非歷史因素，而是中共軍力對其戰略利益的威脅，因此雙方的問題癥結就在南海島礁，一但問題獲得解決，雙方的衝突對立將容易化解。

傳統上印尼是對中共抱持不信任與疑慮的態度，印尼發生「930政變」時，中共就被懷疑是幕後黑手，從此印尼政府就採取堅決反共的立場。雖然印尼並非南海島礁的爭端國，但是中共在此區域的強勢作為，也引起印尼的高度關注。此外，印尼政府對中共發表關切其國內反華暴動事件聲明，印尼激烈回應表示中共不應干涉印尼

³⁶ Goh Chok Tong, "Give China 'Time and Spac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y 25, 1995, p. 30.

³⁷ Nayan Chanda, "Fear of the Drag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13, 1995, p. 28.

³⁸ Nayan Chanda, "Fear of the Dragon," pp. 10-11.

內政，雙方的關係也一度緊張。³⁹ 印尼最關切的是中共與其他國家，爲了南海島礁問題在印尼周邊發生武裝衝突，此將波及或影響印尼本土的安全與利益。⁴⁰

歷史上，越南曾數度被中國佔領，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越南仍在爲其獨立建國奮鬥，而與日本、法國、美國與中國衝突。中共建政以來曾三次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兩國在更存在南沙島礁主權衝突與海上陸上邊界不明的問題，因此越南對中共有高度的不信任與憂慮。⁴¹ 冷戰結束，蘇聯勢力崩解，對越南的援助幾乎停止，越南爲求國家的生存愈發展，必須開拓新路，隨著中共經濟的起飛以及採取睦鄰外交政策，中越緊張的關係，逐次降低，不僅雙方增加了經濟、文化的交流，更在邊界問題上獲致重大進展。雖然中越雙方對南海島嶼領土問題仍存一些歧見，但是，基本上雙方的態度是友善的，並且在東協各國的共同利益監督下，越南對中共威脅的感受應已大幅降低。

綜上所述，對東協各國而言，「中國威脅論」實質上除了歷史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領土主權爭議。中共在南海領土爭議上，非常注重區域安全機制的功能，爭取區域問題區域內解決，避免美、日干涉；但同時也會對區域內國家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避免區域內國家聯合共同對付中共。同時爲了消除鄰國對中共軍力現代化的疑慮，中共在 2002 年的國防白皮書中，清楚的表明中共的戰略目標與企圖，各國也對中共國防透明化有了更高的期待。中共更在白皮書中宣稱說「支持有助於維持全球和平戰略平衡與穩定的所有活動」；⁴² 除了國防透明化之外，近年來中共衡量區域形勢，在南海領土主權爭議問題，採取了較大的讓步行動。

中共領導人近年來相當努力解決與周邊國家的邊界爭議。對中共而言，邊界問題不僅是領土問題，更是民族問題，稍一不慎，不僅會引發國內民族主義激情，還可能引發外交問題與邊界戰爭。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戰爭史，幾乎都是因爲邊界領土爭議所引發；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1969 年中蘇珍寶島戰爭、1973 年中越西沙之戰、

³⁹ Rizal Sukma, "Recent Development in Sino-Indonesian Relation : An Indonesian View,"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6, No.1, June 1994, p. 36.

⁴⁰ Koong Pai Ching,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Perception of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 p. 11-12.

⁴¹ Koong Pai Ching, pp.3-5.

⁴² 「中共 2002 國防白皮書」, http://www.fas.org/nuke/china/doctrine/natdef_2002.html.

1979 年中共對越南的自衛還擊戰爭，每一次都是因為中共認為他國侵犯其領土主權，但是每一次戰爭的結果，都沒能夠真正解決邊界問題，反而製造更多的敵意與仇恨。因此，1990 年代以後，中共就逐漸採取和平解決領土爭議的原則。目前，中共在和平解決領土問題的原則下，已同大多數的國家簽署陸地邊界劃分條約，劃定邊界已達二萬〇二百二十二公里，佔邊界的總長度的 90% 以上。⁴³ 尚未解決的邊界主要是印度與北韓，另與越南、緬甸的路界部份已只剩一小段的畫界問題。至於在領海方面，雖然中共與東協在 2002 年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為東協國家與中共解決南海島礁爭議，提出和平解決方案；中共與越南也在 2004 年 6 月簽署「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畫界協定」，但是無論是行為準則或是經濟專區的協定，都只是暫態的穩定，最根本的領土主權問題卻是仍然存在的。南海島礁的爭議，將是東南亞區域和平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中共的和平崛起

從 1970 年代的低度開發國家，到了 1990 年代末期卻躍升為全球大型經濟體之一。⁴⁴ 從 1979 年至 1997 年，中共國民生產毛額平均年成長率為 9.8%，因為經濟成長帶動的軍費支出，成長率更高達 17.6%。單以 2003 年公佈的數字推算就增加了約 30 億美元。⁴⁵ 中共綜合國力的快速成長，增加各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美國對中共的崛起尤其表示強烈的憂慮。美國「國家情報會議」(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撰寫的「2015 年全球趨勢」(Global Trend 2015) 認為，中共的躍升所帶來的意涵是「全球將呈現極大的不確定性」。⁴⁶ 「外交關係會議」(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則提出「中共對美國及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軍事及政治形成重大挑戰」。⁴⁷ 美國蘭德公司 (RAND) 在 2000 年的一項研究中也支援上述說法，並在報告中將中共形容成美國與東南亞國家潛在的軍事威脅。⁴⁸

⁴³ 俞雨霖，〈彈性畫邊界——中共換取戰略空間〉，《中國時報》，2004 年 11 月 3 日，版 A14。

⁴⁴ Carolyn W. Pumphrey, *The Rise of China in A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2), p. 1.

⁴⁵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Security, *A Concert for Preserving Security and Promoting Freedom*, (Washington, GPO, Dec 2000), p. 9.

⁴⁶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ational Foreign Intelligence Board, NIC), *Global Trend 2015*, (Washington, GPO, Dec 2000), p. 63.,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globaltrends_2015/

⁴⁷ James Robert Kerrey & Robert A Manning, http://www.ciao.org/conf/crf_25/

⁴⁸ Richard Sokolsky, Angel Rabasa, C.R. Neu, *The Role of Southeast Asia in U.S.*

2003年11月3日，原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在博鰲亞洲論壇的一次演講中，第一次提出「和平崛起」。2003年12月10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訪美期間，至哈佛大學演講時，鄭重提到了「和平崛起」的概念。直至2004年3月14日，短短3個月的時間內，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又先後3次在公開場合談到中國的「和平崛起」。

中共提出「和平崛起」是為了駁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其中所盛行對中共的觀點，亦即是要以「和平」來駁斥「中國威脅論」，更以「崛起」駁斥「中國崩潰論」。⁴⁹事實上，中共提出「和平崛起」的論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外交，而經濟外交含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指經濟方面的外交，二是指把經濟作為手段而達到其他的目標。中共經濟起飛以及穩定的發展，已經大大舒緩「中國崩潰論」的疑慮，正如鄭必堅參加在義大利舉行的第30屆世界高峰年會中的演講所說：「中國經濟形勢總體是好的，但經濟結構不合理，農業、能源、環境、投資等一些發展中的問題比較突出。去（2003）年下半年起，中國政府針對經濟結構、體制、增長方式存在的問題，採取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目前看，我們的宏觀調控措施已初見成效」。⁵⁰中共雖自承其在經濟發展的制度面及現實面上仍存有一些矛盾與不足之處，但基本上世界各開發國家，已能接受中共的經濟建設成果，並認同中共接受全球化的經濟潮流影響，繼續採取改革開放的政策，而非自外於世界總體經濟體。中共更提出當今世界並非只有中共一個國家正在崛起，事實上現今世界正有許多國家，正以不同途徑、模式和進度，逐漸崛起。中共認為「和平崛起」只是為當代中國自身的角色與未來形象定位，也是中國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承諾。因此「和平崛起」的論調，最主要的仍是要祛除各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引人注目，特別是近幾年，中共崛起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門話題。在國際政治中普遍認為，崛起的方式往往比崛起本身對世界的影響更大。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崛起的速度、方向、意識形態以及對國際政治勢力平衡的影響，均會帶給其他國家一些疑慮、嫉妒和恐懼感，也會引起反抗和反作用的

Strategy Toward China, (Santa Monica, Ca.: RAND 2000), chapter 2.

⁴⁹ 請參閱，胡聲平，2004年7月12日，對丁永康於和平論壇發表之〈和平崛起與兩岸關係〉論文評論，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2:5&webitem_no=845

⁵⁰ 鄭必堅，〈中國的發展與和平崛起新道路〉，於第30屆世界高峰年會演講內容，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709763.htm>

效果。它包含的不僅有爭取和平的外部環境、發展自己經濟的內容，也包含著試圖超越意識形態的束縛，爭取現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的認同，甚至將之定為一項根本性的國家發展戰略的目標。

事實上，不論中共是和平崛起或是積極擴張，都將無法改變中共政治、經濟、軍事等綜合國力正快速發展與不斷提昇的事實與趨勢。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中共崛起已成必然，國際社會應面對現實，而最該重視不是中共崛起後的走向，而是中共會用何種方式崛起。因為崛起的方式決定大部分的未來趨勢，僅討論未來走向將容易喪失對現況的掌握。中共的學者認為中共的和平崛起是一個新的發展戰略，並將中共和平崛起戰略分為三個階段：

- 一、營造階段；主要是營造安全的周邊環境，這是一種維護型的戰略，強調主權與領土不可分裂。
- 二、塑造階段；塑造對中共有利的安全環境，這是一種主動型的戰略，主要目標是收復失地。
- 三、經略階段；經略一個對中共有利且國際社會又能普遍接受的政、經新秩序，達成戰略平衡與穩定。⁵¹

中共認為其自己與歷史上其他強權興起，以戰爭掠奪的方式大為不同的是，中共的和平崛起靠的是開放價值與制度體系的形成，靠的是中共自身的發展而不是靠戰爭掠奪；因此中共的崛起基本上是和平與發展並重的。但是，從其崛起的三個階段來看，中共的和平崛起並不是純粹守勢或內斂型的戰略運用，其實質內涵仍不脫離建構一項外向型的擴張戰略。現階段，基於現實的實力不足，中共仍處於第一階段的營造時期；中共意識到營造環境安全，最重要的就是要消彌周邊國家對其崛起的疑慮，因此近年來中共提出「以鄰為伴、與鄰為善」以及「睦鄰、富鄰、安鄰」的政策方針。⁵²中共更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其目標在改善與中亞鄰國的關係，與東協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以及「友好合作協定」，亦是為了營造安全環境；此外中共又發起博鰲論壇的對話，希望藉由主導論壇討論議題，釋放出中共善意及其建立「亞洲價值」的戰略構想。中共崛起的第一階段已逐步成功，並進而走向主動塑造安全環境的地步，亦如今（2004）年在寮國舉行的東協第十屆高峰會後的東協加三會議中，中共總理溫家寶雖不再提出「和平崛起」，但是全世界卻看到一個充分準備、急於領導的中國在東南亞崛起。⁵³如果再給予中共

⁵¹ Xiu-Chuan Kweng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Study Post* (Beijing),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xsb/548118.htm>

⁵² 徐堅，〈和平崛起是中共的戰略選擇〉，《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4年第2期，頁4-5。

⁵³ 林正義，〈中國在東南亞的崛起〉，《中國時報》，2004年12月2日，版

幾年，逐步累積其政、軍、經實力，未來中共的戰略走向，是否會改變是值得觀察的。

東協對中共的一貫外交態度是謹慎與敏感的，大多數的東協國家知道，近年來中共一直對周邊國家示好，但在骨子裡，中共絕不是一個芳鄰，也絕對沒有必要去激怒中共。基本上，東協與中共雙邊關係是政治導向的；從早期的恐共、圍共與敵對立場，到 2003 年簽訂友好合作條約，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因素，應是東協對中共的觀念改變，也就對中共角色認定的轉變。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東協曾因中共在亞洲進行意識型態的向外輸出與擴張，而視其為極具危險的敵人；⁵⁴ 在冷戰高峰期，更將中共視為與蘇聯相同之意識型態不同的敵人，更認為中共是此時期各國內部共黨叛亂的黑手。因此東協國家在冷戰結束前，對其中共的看法是「繼續將東南亞視為其勢力範圍，並將持續威脅東南亞區域安全」。⁵⁵ 冷戰結束後，中共與東協關係已邁向新的階段，彼此體認到「以合作替代衝突」、「以對話代替對抗」、「以經濟合作替代政治抗衡」之重要性，形成雙邊實質利益的共識，特別是 1994 年中共與東協成立經貿聯合委員會與科技聯合委員會，1995 年建立副外長級的官員磋商制度，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區域論壇」及「亞歐會議」(ASEM) 等組織，同時也利用這些多邊機制為中共建立更多密切的關係。中共積極參與各種多國信心建立活動，使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國際行為樂觀轉變。近年來雙邊貿易成長率均以 20% 以上的速度增長，且東協國家對中共的投資也大幅增加。此全面的政治對話機制與經濟合作，不僅維護雙邊共同利益，也將提供中共與東協發展新關係的契機。⁵⁶

在 2003 年的東協會議上，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把中共比喻成「友好的大象」，認為中共的崛起不存在任何威脅。但在東協國家普遍視中共的和平崛起是伴隨挑戰的良機而非威脅的時候，東協國家仍舊注意到中共對其領土主權的堅持。汶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與越南都有與中共的領土爭議，且中共的手段及態度未曾軟化，雖然在 2002 年簽署「南海區域行為準則」，希望暫時消除或隱藏一些彼此不愉快的事情，共同專注於經貿、安全等領域的建設合作；但東協各國也清楚的知道，中共影響力的增加，無

A4。

⁵⁴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 Century, (2001.10), <http://www.us.asean.org/asean.asp>.

⁵⁵ Ailean S.P. Baviera, PASCN Paper, No.99-117 (1999), http://pascn.pids.gov.ph/disclist/d_99/s00-17.pdf.

⁵⁶ 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rnals/160-9/m169_2.htm

疑的會在該區域產生一些安全上的顧慮。東協國家也公開表示，相信中共的企圖是善意的。⁵⁷但是，世界各強權對中共崛起後的反應，以及「九一一」事件以後各強權在東南亞區域勢力的較勁，將會成爲區域安全與發展最重要的因素。

⁵⁷ Shi Chunlia, *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 A Chinese View*, <http://www.aiia.asn.au/news/chunlai.html>.

小 結

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都深受中國的影響，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就一直不斷的向南方輻射出它的影響力。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以後，東協對中共威脅認知的演變，就深受歷史因素、領土主權爭議以及中共和平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在歷史因素方面，在中美建交以前，中共對東南亞國家共黨的援助，使得東協認為中共是東南亞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中美建交後，中共停止對區域共黨的物質援助，同時中美聯合對抗蘇聯的情勢，間接也使得中共抑制了越南在中南半島勢力的擴張，相對的也改變了東協對中共的觀感。隨著中共領導人的更迭以及中共經濟的起飛，更加深了東協與中共的交往與合作。中共實施四個現代化後，經濟逐漸站穩腳步，更對東南亞國家採取懷柔的睦鄰政策，尤其在其富鄰、睦鄰與安鄰的「三鄰」政策下，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已經可說是穩穩接收美、蘇在區域的地位。此外藉由參與多國組織的對話，積極爭取區域的各項議題主導權，並對與東協各國在領土主權的爭議上，採取積極解決與擱置緩議並進的手段，切斷其他國家介入的機會，並給予東協各國與自己一個迂迴的戰略空間，雖然世界各國並不看好未來針對擱置議題的順利解決；但以東協與中共近來良好的互動關係觀察，未來這些爭端的和平解決，是存有無限可能的機會。

現階段東協視中共為伴隨挑戰的機會，而非威脅。在東協與亞太區域的信心建立活動的努力下，東協也給予中共更多參與東協事物的機會，雙方對合作共榮的前景看法樂觀一致。但是，朝鮮半島去核、台海問題以及南海島礁主權爭議所潛藏的危機一如往昔，中共對上述問題立場的堅持，並未因為和平崛起而退讓三分。「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勢力企圖重回東南亞，但中共與東協的接觸頻繁，雙方互賴程度更深，此外在人權問題與亞洲價值觀的問題上，美國與亞洲國家的對立立場未能消除，因此，未來區域安全與發展的主導權，仍將以東協與中共的關係為其核心。

東南亞是中共最想要，也是最有可能出現多極化取代美國單極化的區域。中共領導人最喜歡講的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亞洲，亞洲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若不能在東南亞稱霸，就稱不上崛起。⁵⁸事實上中共對東南亞的戰略規劃是極為縝密的，連美國、日本都

⁵⁸ 林正義，〈中國在東南亞的崛起〉，《中國時報》，2004年12月2日，版A4。

望塵莫及；中共從睦鄰外交政策，一直走到成為與東協簽定友好合作條約的第一個區域外國家，甚至在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規劃協商進度，更遠遠走在其他國家的前面，這些改變，絕不是脅迫壓力或是利誘可以達成，它帶給美國、日本等大國一種落後的感覺，更逐漸形成另一種威脅，顯示中共在東南亞的戰略是正確的。

在中共的積極努力下，東協這個一向堅持拒絕外國參與的區域組織，改變了對外的態度，東協各國對中共的認知從敵人的角色，逐漸變成競爭夥伴，正如建構主義從所說的從霍布斯體系走向洛克體系，甚至具有康德體系的雛形；中共雖然在 2004 年底，為求降低對世界各國的威脅感，改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的說法，使得東協各國與中共的關係再次轉變；這種對角色概念認定的改變，竟也使得如此複雜的多邊關係愈來愈清晰；東協對中共和平發展，普遍視為一種善意與具有挑戰內涵的機會，東南亞區域進一步的整合，或是東亞區域整合的未來，中共與東協關係的後續發展將是非常重要的因素。